

《圣经》译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任东升 温秀颖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1)

提 要:20世纪之交的《圣经》译介主要是出于宗教宣传的需要,但是在客观上使中国现代作家接触到了基督教文化和圣经翻译文学。他们出于精神的渴求、知识的兴趣和艺术的追求,主动汲取圣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在语言形式、艺术风格和美学内涵上都受到圣经翻译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圣经译介;圣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4)01-0021-05

Influence of Bible's Introduction up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N Dong-sheng WEN Xiu-ying

Abstract:The translating of the Bible into China around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primarily aimed at population of Christianity, introduced Christian culture and translated Bible literature to modern Chinese lettermen. Chinese writers approached Bible literature out of their spiritual thirst, curiosity about the Biblical world and search for literary inspiration. The translated Bible literature exert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up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language, style and aesthetic fibers.

Key words:introduction of the Bible into China; Bible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fluence

一、20世纪之交《圣经》在中国的译介

20世纪之交,基督教以西方宗教和外来文化的双重身份进入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的经典《圣经》首先通过传教士汉学家的译介与当时的主体文化发生了联系。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和宽松的宗教环境下,《圣经》被当成与马克思主义著作、进化论思想加以礼待。陈玉刚先生对这一时期的《圣经》翻译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传教士由于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需要,已不断地在翻译《圣经》。《圣经》,特别是其前一部分《旧约全书》,既是一部宗教书,又是一部希伯来文学总集,其中公元前十三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希伯来民间史诗、神话传说、战歌、寓言、抒情诗等,都有很好的文学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经》也可以说是我国翻译文学作品的一种。(陈玉刚,1989:26)

从1819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境内翻译完文言文《圣经》,到1919年“和合本”《圣经》问世的一百年间,是《圣经》在华得到译介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出现了深文理(文言文)、浅文理(浅文言)、官话(白话)3种文体共9部完整的中文圣经。(庄柔玉,2000:128)西方传教士的汉译《圣经》主要是求信、求达,后来中国学者翻译《圣经》则在

信、达基础上求雅、韵,并与许多中国传统文学表述手法相对照、相比较,甚至尝试以某种中国文体或诗体来翻译《圣经》,使《圣经》的翻译成为一种中国文学的再创作。(卓新平,2000:268)如译界泰斗严复曾用“文笔古雅”的文言文译出《马可福音》1-4章(朱维之,1992:72),1908年在上海发表(Chan Sin-wai and David E. Pollard, 1995:58)。许地山曾翻译《雅歌》;吴经熊博士则用五、七言古诗体尝试翻译《诗篇》;李荣芳用“骚体”译出《哀歌》全部五章。(朱维之,1992:72)《圣经》的汉译呈现出文学化的趋向(任东升,2003)。

二、中国文学界对圣经文学性的介绍

配合圣经文学翻译的高涨,中国学者、文学家和翻译家积极介绍圣经文学,澄清了许多对《圣经》的错误认识,引导了中国文学界对圣经文学的接受。鲁迅是最早通过文艺论文介绍圣经文学性的中国文学家。在他眼里,《圣经》的文学地位是很高的“特在以色列族,则至耶利米(Jeremiah)之声;……然《哀歌》而下,无庚响矣。”“耶利米之声”就是《圣经·旧约》中被誉为希伯来文学精品的《耶利米哀歌》(Lamentations)。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新文学的肇始,青年们如饥似渴地读起外来的作品,《圣经》也渐渐地被他们注意到了。(朱维之,1992:73)随着

“和合本”的流传,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两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对圣经的文学性进行了介绍。

“文学研究会”领导人郑振铎在1921年7月发表了《翻译事业之研究》,在首段就威克立夫(Wyclif)的《圣经》译本和路德(Luther)的《圣经》译本分别对英国散文、德国文学的影响,说明《圣经》对西方文学的陶冶作用。同年,他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介绍了《圣经》的文学性,并对照“钦定本”《创世记》翻译了开头五节。(郭沫若,1984:375-378)为了配合对圣经文学性的研究,郑振铎还对《圣经》故事作过文学性的述评。他认为,“《圣经》具有无比的价值与重要。其中的几篇,他们的艺术的精神值已到达了极峰。”(胡绍华,1999:14)

“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周作人早在南京求学时就通过“钦定本”《圣经》学习英语,曾经几次想动手翻译《圣经》。(朱维之,1992:72)在“和合本”出版后仅两年,即1921年初,他专门发表论文《圣书与中国文学》,对“和合本”评价很高。在论及《圣经》译介在中国新文学创立时期的积极作用时,他指出:“《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极大的关系。”(周作人,2002:43)直到1951年,周作人依然把圣经翻译看作是与佛经翻译同等重要的伟大时期,并在其设想的中国翻译史的三个阶段里划出第二阶段的起点——清末之译“圣”经。(陈福康,2000:401-402)

“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也很早注意到白话《圣经》的翻译。他在《文艺论集·续集》中说:“合译一本,基督教徒运用得最为敏活。”(《沫若文集》十卷第56页)指的就是白话圣经的翻译。

鲁迅、郑振铎、周作人和郭沫若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对圣经文学性的介绍和对白话《圣经》语言优点的肯定,直接促进了圣经文学在一代青年作家中的进一步传播。

三、《圣经》译介对中国现代语言转型的影响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和介绍对中国文学语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有直接关系。梁启超领导的文学革命,语言是一个需要变革的重要因素。他说过:“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包礼祥,2001:179)19世纪后半叶,虽然深文理或文言文在中国的书面语言中占统治地位,但出于开启民智的需要,较通俗的浅文理文体和白话应时流行开来。《圣经》译者及早

地适应了白话时代的到来,1919年2月出版了白话文《圣经》(“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又称“蝴蝶本”;1939年更名为《国语和合本》)。这是一部真正的具有“文学品味”的译本(赵维本,1993:43)。由于它恰好在新文学运动前夕完成,遂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朱维之,1992:70)。由于这部《圣经》是中国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著作中最为准确、审慎的好译本,销量以百万计,它与当时知识界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不谋而合,为开拓白话文学的先驱们提供了一块他山之石,对新文学无形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Janice Wickeri, 1996)。中文《圣经》以其自身的汉语文采吸引了大批中国读者。正如朱维之所回忆的中国文学青年阅读白话《圣经》的场面:

五四前夕完工的“官话和合本”《圣经》新译本,也引起了文学青年的好奇心,对其中的《诗篇》、《雅歌》、《约伯记》、《马太福音》等也觉得美不胜收。

(李寿兰,1989:189)

早在新文学运动开始之初,有人攻击说“白话是马太福音体”,鲁迅就回答:“马太福音是好书,更应该看。”(鲁迅 a,1982:89)1921年,周作人著文《圣书与中国文学》,论及《圣经》与中国新文学在“精神与形式”两方面的关系时说,《圣经》在中国“时地及位置都与欧洲不同,当然不能有完全一致的结果,但在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上也必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与便利,这是我深信不疑的:这个动因当是文学的,又是有意。”(周作人,2002:43)1947年,郭沫若将《圣经》翻译和佛经翻译、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相提并论:“让我们想到《新旧约全书》和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于现行的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郭沫若,1984:335)对于《圣经》译介对中国现代文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的影响,鲁迅所持的肯定态度、周作人的远见卓识和郭沫若的回顾总结都说明,《圣经》译介确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圣经》译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圣经》译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直接关系,可以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三)收录的两首《旧约》诗歌——《弓歌》和《雅歌》窥见一斑。(施蛰存,1990:95-102)这两首诗歌虽然都是由传教士主译的,却被中国文学界当作“翻译文学”看待。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如鲁迅、郑振铎、茅盾、林语堂、许地山、王统照、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冰心、闻一多、徐志摩、巴金、老舍、曹禺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证、评

述或介绍过圣经文学。那些曾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人,如冰心、许地山、张资平、林语堂、曹禺、萧乾等对《圣经》有着更特殊的认识。

冰心、沈从文、萧乾等作家初事写作都是从模仿《圣经》开始的。基督教文化通过其主要书面载体《圣经》广泛地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主体,中国作家也有意识地以借鉴《圣经》内容服务于自己的创作意图。

1. 《圣经》语汇、典故和意象进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朱自清曾说:“近世基督教圣经的官话翻译,也增富了我们的语言。”(梁工,2001:400)《圣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映,最先见于圣经典故、意象和文句,甚至个别章节出现在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里。早在晚清的“诗界革命”中,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等都喜欢用《新约》的词句、典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郑欣森,1996:316)鲁迅亲自买来《圣经》阅读(鲁迅1925年2月21日、1928年12月12日的两篇日记均有购买《圣经》的记载)。在他一生的文章中,直接或间接引用《圣经》故事、典故、箴言达几十次,并常常引申出精辟的见解。(梁工,2001:401)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郭沫若率先使用《圣经》典故。例如在其新诗《女神之再生》中使用了“旧皮囊装新酒”的比喻:

姊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郭沫若,2000:5)

再以巴金为例,他对圣经题材的汲取、典故的运用以及词汇的引用多达63处以上(胡绍华,1999:143)。《圣经》的典型意象如伊甸园、十字架、马槽、鸽子、蛇等流溢于艾青的早期诗作,在诗人的整个审美创造中实现了对《圣经》中的苦难意象、献身意象与光明意象的创造性转换。这三大圣经意象的多样组合与呼应使艾青的诗作获得了丰厚的文化学内涵,也构成了他的诗歌博大沉郁、幽邃庄严的美学风格。

2. 中国作家引用《圣经》章节代替前言和序言

不少现代作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引用《圣经》的经文代替前言和序言,来说明作品的主体思想。如巴金的《电》最初发表在《文学季刊》时改为《龙眼花开的时候》,在其上、下篇引用了《启示录》和《约翰福音》中的6段经文,巧妙地暗示了小说的题旨。又如曹禺初版的剧本《日出》扉页上有一篇特别的题辞。除了一段《道德经》外,其它7段摘自《旧约》的《耶利米书》、《新约》的《约翰福音》、《罗

马书》、《格林多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以及《启示录》,中文均引自白话《圣经》。如此之多引述《圣经》经文作为全剧的题旨,在现代文学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如最后两节: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

《约翰福音》第11章

“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

《启示录》第21章

这一做法与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卷首引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中四个章节的做法颇为相似。(汝龙,2000:3)通过引用《圣经》经文,剧作家含蓄地点明了自己的创作意图:题辞中的“光”与剧本中的“日出”是同一种意蕴。

3. 中国文学家化用《圣经》内容

中国作家根据自己的文学理解对《圣经》素材进行选择,并作了适当的调整、增删、归纳,直至强化、改造,借《圣经》故事传达自己的某种情绪与心声。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中国文学家对《圣经》内容的“化用”。从下面几则作品目录和取材来源可以看出,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有对《圣经》内容的编译之嫌。

题裁	作者	作品	取材	
创作	散文	鲁迅	《复仇·其二》	《马太福音》
	小说	茅盾	《耶稣之死》	《福音书》
			《参孙的复仇》	《士师记》
	诗歌	艾青	《马槽》	《路加福音》
			《一个拿撒勒人的死》	《约翰福音》
		徐志摩	《卡尔佛里》	《福音书》
	戏剧	冰心	《客西马尼花园》	《路加福音》
《髑髅地》				
向培良	《暗嫩》	《撒母耳记》(下)		
翻译	小说	茅盾	《耶稣与强盗》	《福音书》
	戏剧	茅盾	《美尼》(独幕剧)	
			《耶稣与淫妇》(比利时梅特林克)	《福音书》
田汉	《莎乐美》(英国王尔德)	《马可福音》		

“耶稣之死”历来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文学题材,耶稣的英雄形象反复撩动着中国文学家的艺术情致。鲁迅1924年发表的《野草·复仇(其二)》、徐志摩的《卡尔佛里》(Calvary的音译,为耶稣的受难地)、艾青的《一个拿撒勒人的死》(耶稣出生于拿撒勒)、冰心的《客西马尼花园》(耶稣被捕前祷告的地方)和《髑髅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Golgotha),

都演绎了这个《圣经》主题。鲁迅的散文直接从《圣经》取材,相当忠实地依据了《马太福音》的第27章,通过耶稣的形象表现了革命者的意志和对“庸众”的痛斥。徐志摩和艾青的诗作都蕴含了自己的理解和评论。冰心的作品则只是客观地表现耶稣受难的场面。

茅盾也采用《圣经》内容作为创作的材料来源。1942年,他主要取材于《新约》四福音书耶稣传道、受难的故事写成了《耶稣之死》;根据《旧约·士师记》第14-16章以色列大力士参孙的故事写成了《参孙的复仇》。这两篇小说与其说是茅盾个人的文学创作,倒不如说是他对《圣经》内容的编译。如《耶稣之死》第2节取材于《旧约·以赛亚书》第2章和第40章部分内容。所谓的先知以赛亚得到上帝的“默示”,就是直接照抄了现成的白话《以赛亚书》第2章的2-4节。(茅盾,1980:636)

向培良依据《撒母耳记》(下)第13章以色列国王大卫的长子暗嫩(Amnon)诱奸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Tamar)而被他玛的胞兄押杀龙杀死的戏剧性情节,创作了剧本《暗嫩》。以艺术风格而论,向培良的这部作品属于“中国话剧那些唯美倾向的剧作”(胡绍华,1999:161)。曹禺和田汉对取材于圣经故事的戏剧的翻译介绍,为中国翻译文学引进了圣经文学世界的异国情调,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

4. 《圣经》对中国作家话语方式的影响

《圣经》诗文杂存,情文并茂。丰富多彩的文体和雅俗共赏的词章句式具有很强的传情达意功能。现代作家,尤其是那些接近西方文化和熟悉西方文学的中国现代作家,由于对《圣经》内容烂熟于心,故影响到他们的话语方式甚至文学思维方式,不知不觉在文学创作中掺进《圣经》句式,成为他们个人写作风格的一种构成因素。如鲁迅在一篇早期文章中写道:

有谁将我们引出旷野?

我们的家园失去了,国家被毁灭了,但我们没有面对世界和子孙唱最后一首歌的耶利米。

(傅光明、梁刚,1992:106)

这里使用了《圣经》中两个著名的人名典故:率领以色列民族摆脱埃及统治、走出旷野的民族英雄摩西(Moses)和忧国忧民、为以色列民族奔走哀告的先知耶利米(Jeremiah)。鲁迅的语气也有几分耶利米式的呼号。

剧作家曹禺并非基督徒,但从小对《圣经》就感兴趣,反复研读《圣经》和圣经文学,并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艺术创作模式。他的《雷雨》展示了“父罪及子”的报应,《日出》则折射出“光”的启示,《原野》回

荡着“救赎”的哀求。这三部早期剧作在艺术思维上充满《圣经》的伦理意识。

巴金作品的一种特有风格,即直抒胸臆,以情感人。有时直接向读者倾泄感情,有时借助别人的话语打动读者的心灵。如在《简短·病》中,他借用《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的话语叙述自己“明天的信仰”。在小说《新生》的末篇,巴金插入了《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的一段话: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被尊崇为“中国现代小说一代宗师”的郁达夫,早在1921年创作的小说《南迁》中,通过主人公“伊人”——一位信仰基督教的中国留学生之口,两次引述了“钦定本”《马太福音》原文,一处来自《马太福音》第5章的28、29两节,另一处则是《马太福音》第5章的2节。(郁达夫,1996:75)第一处引文(见Holy Bible第889页)没有译出中文,从描写主人公意识流的需要的角度来看,这段引文很自然地与其上下文融为一体。

以《圣经》式的“救赎模式”构思故事,最典型的莫过于冰心了。冰心的许多作品如《十字架的园里》、《晚祷》、《相片》等都带有《圣经》的明显特征。另外,冰心的许多赞美诗具有圣经“赞美诗”的意蕴和风格,许多散文采用了类似圣经书信体的书信体、笔记体和书简体。如她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中写道:

天上的星辰,骤雨般落在大海上,嗤嗤繁响。海波如山一般汹涌,一切楼屋都在地上旋转,天如同一张蓝纸卷了起来。树叶子满空飞舞,鸟儿归巢,走兽躲到它的洞穴。

再看《启示录》第6章的13-14节: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被挪移,离开本位。(《圣经·新约》第439页)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冰心对圣经意象、句式、语调的未加雕琢、浑朴自然的运用,甚至达到思维方式上的“化用”。

引用《圣经》原文或译文也好,化用圣经意象、句式和语气也好,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作家的创作动机、取材方式和文体风格。《圣经》就是这样通过中国作家的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

5. 沈从文模仿《雅歌》而开创“牧歌体”

周作人早在1921年预测《圣经》将“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极大的关系”,真可谓“先人之见”。他又说:“希伯来古文学里那些优美的牧歌及恋爱诗等,在中国本很少见,当然希望他帮助中国的新

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周作人,2002:42)现代著名作家、诗人沈从文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作出响应。他以《雅歌》为取法对象,以亲闻目睹的湘西苗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为题材,写出了一系列表达男女强烈爱情的“牧歌式”抒情诗篇。他的小说《看虹录》中对人体的描写就明确引用了《雅歌》,将两性关系神圣化。中国现代文学百花园里多了“牧歌体”这朵奇葩,使中国文学的肌质增添了牧歌般的激情、率真和人体美的美学内涵。这是《圣经》译介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最显著影响。

五、结论

今天的中国学者认为,中文《圣经》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邹振环,1996:36-40)。《圣经》在中国的译介,主观目的虽然在于宣扬基督教,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各种《圣经》中文版本的流传,使中国文学家间接或直接接触到了圣经文学,中国学者和文学家们对圣经文学性的评介则促进了圣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圣经》的关注主要出自于精神的渴求、知识的兴趣和艺术的追求。圣经文学通过他们的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情趣,影响到现代文学的文学语言、艺术风格和美学内涵,乃至影响到现代文学的整体风貌。

参考文献:

- [1]包礼祥.近代文学与传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3]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 [4]梁工.基督教文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 [5]崔宝衡.朱维之[Z].南开大学办公室.南开人物志(第2辑)[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 [6]路易斯·罗宾逊.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M].傅光明,梁刚译.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
- [7]郭沫若.浮士德简论[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8]郭沫若.女神[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9]胡绍华.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10]李寿兰.文学翻译百家谈[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1]鲁迅 a.鲁迅全集(第八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2]鲁迅 b.鲁迅全集(第七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3]茅盾.茅盾短篇小说集(下):耶稣之死[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4]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 [15]任东升.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86-91.
- [16]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新标准修订版)[Z].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
- [17]施蜃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三)[Z].上海:上海书店,1990.
- [18]郁达夫.郁达夫短篇小说全集[Z].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 [19]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M].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
- [20]郑欣森.鲁迅与宗教文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21]周作人.艺术与生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22]朱维之.古希伯来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23]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2.
- [24]庄柔玉.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权威现象研究[M].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
- [25]卓新平.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Z].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 [26]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 [27]I-Jin Loh.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A]. In Chan Sin-wai and David E. Pollard (eds.). *An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Z].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8]Wickeri, Janice. The Union Version of the Bible & the New Literature in China [J]. *The Translator*, 1996,1(2): 9378.

收稿日期:2003-04-16

作者简介:任东升,男,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翻译研究;温秀颖,男,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路小明